

长辛店: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发源地

长辛店工人运动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起点与典范,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、中国共产党创建史、中国工人运动史上,都占有十分重要而特殊的地位。长辛店不仅留下了李大钊、邓中夏等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的革命足迹,也孕育出史文彬、王俊、杨宝昆等中国最早的工人党员代表,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发源地。

“自治能力吾人亦嗟乎其早”

长辛店,地处北京西南卢沟桥附近,距天安门直线距离约20公里。俄国十月革命后,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意识到工人阶级蕴藏的巨大力量。长辛店作为北京铁路工人的聚集地,是知识分子的团结对象。1918年夏,华法教育会的蔡元培、李石曾等在长辛店设立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。

5月4日,五四爱国运动爆发。北京学生举行示威游行时,就有长辛店留法预备班的学员和铁路工厂的艺员养成所的学员,以及车务见习所的学员参加。他们回到长辛店后,立即在广大工人中进行爱国宣传,组织“救国十人团”,开展斗争。当时北京《益世报》赞誉长辛店工人“不但爱国之心之纯粹、真切为学界所不及,即自治能力吾人亦嗟乎其早”。5月7日,长辛店铁路机厂“柳工场铁匠史文彬,带领100多名工人,上街示威游行,组织罢工,开展反帝爱国斗争。这次罢工尽管规模不大,但它是中国工人阶级的第一次政治性罢工,因此被视为中国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的预演。

6月3日,上海工人大罢工后,史文彬、张

珍等带领着许多工人和留法预备班、艺员养成所、车务见习所的学生,在长辛店大街上示威游行。6月10日,正当长辛店工人准备全体罢工的时候,受全国人民的强大压力,北洋军阀政府不得不释放被捕学生,撤销曹汝霖、章宗祥、陆宗舆的职务,并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。五四运动由此获得胜利。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,长辛店工人的无产阶级觉悟得到大大提升。

“工人的力量比天大”

为了进一步深入工人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,1919年3月,在李大钊指导下,邓中夏在北京大学组织建立“平民教育讲演团”。1920年4月,北大“平民教育讲演团”接受了当时在团里担当领导职务的邓中夏的建议,开始到长辛店开展讲演活动。1920年12月19日,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派邓中夏、张太雷、杨人杞、张国焘到长辛店商讨筹办劳动补习学校事宜。

1921年1月1日,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正式开学。它以增进劳动者和劳动者子弟的完全知识,养成劳动者和劳动者子弟高尚品格为宗旨,在工人中间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,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。劳动补习学校分日夜两班上课。夜班是工人上课,设国文、法文、社会常识、科学常识、工场和铁路知识;日班是工人子弟上课,课程与普通国民高等小学堂的课程略同。

教员大都由北大师生担任,李大钊和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其他成员,都曾去该校视察或讲课。在一次讲课中,李大钊在黑板上写工人两个字,当他问起工人们这两个字合起来念什么时,突然一位工人回答:“老

师,我认识,念‘天’!”李大钊高兴地说:“天就是你们工人,工人的力量比天大。”

教员们讲课,先教识字,再讲革命道理,使工人们既能学习文化知识,又能听到革命道理。学校还订购了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办的宣传读物,如《劳动周刊》《劳动者》《劳动音》《共产党》月刊等。劳动补习学校开办后,长辛店工人的政治觉悟得到迅速提高,尤其是李大钊、邓中夏等在工人中所进行的启发式教育,一方面使工人坚定地站到马克思主义者一边,另一方面这些先进的知识分子也通过与工人的接触,认识到中国发展的前途和出路所在。

“北方劳动界的一颗明星”

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通过创办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,把工人紧密团结起来,不断教育和启发了工人的阶级觉悟。但是,邓中夏说:“这个学校(即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)当然只是我们党在此地工作的人手方法,借此以接近群众,目的在于组织工会。”因此,由李大钊、邓中夏等指导,史文彬、王俊、谢德清、陈励懋、洪永福等工人带头,串连各处工人,开始筹建工会组织。

1921年5月1日,长辛店1000多名工人在娘娘宫召开庆祝“五一”国际劳动节大会,天津、保定等地的工人代表也专程前来参加。会上决定成立“长辛店铁路工人会”。会后,工人们举行了游行示威,散发传单,以及《五月一日》《工人的胜利》两本小册子,高呼“增长工资”“缩短工时”“工会是最好的法子”“平等”“最合理的事情是每天工作八小时”“官僚是公仆,工人是主人”“五一节万岁”“劳工万

岁”等口号。当时出版的《共产党》月刊对长辛店工会评价道:“五月间,他们组织了一个工会,……他们的努力,实可令人佩服,不愧乎北方劳动界的一颗明星。”

1921年5月5日,长辛店铁路工人会正式成立。各地工人纷纷到长辛店参观访问。“大家不觉油然而生羡慕之心,在当时工人们仿佛觉得长辛店是工人的‘天国’”。他们将长辛店工会组织当作样板,纷纷在各地建立自己的工会组织。这是中国工人阶级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,党领导建立的第一个产业工会。它的成立对于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积累工作经验,推动工人运动的深入,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创建都具有重要意义。

“中国工人运动还是从长辛店铁路工厂开始的”

1921年7月,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。张国焘、刘仁静代表北京党组织,向大会汇报了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以及长辛店铁路工人会的情况。大会通过的《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》,充分吸收了他们的意见,明确提出:“本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。……工人学校应逐渐变成工人政党的中心机构。”从党的第一个决议可以看出,长辛店工人运动对党的创建和发展的重要意义。中国共产党创建伊始,主要处于秘密状态,为了公开领导工人运动,1921年8月,中共中央组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,并指示要在工人群众中发展党员。长辛店是北京地区开展工人运动最重要的实践基地,经邓中夏等人努力,先后吸收了史文彬、王俊、杨宝昆、康景星等工人入党。北京党组织通过这些骨干力量,开始对

长辛店铁路工人会进行整顿。1921年10月20日,长辛店机器厂、修车厂、工务厂的工会代表召开联席会议,决定将长辛店铁路工人会改组为“京汉铁路长辛店工人俱乐部”。因为长辛店铁路工人会混进的工头、员司、巡警,并非真正代表工人群众的利益。另外,长辛店工人俱乐部,以俱乐部之组织,行工会之实。俱乐部这种方式,政治色彩相对较淡,便于党领导工人运动。

当时有人认为:“工会是如俱乐部一样,是工人娱乐的机关”;“工会是如救济会一样,是工人互相救济的机关”;“工会是如研究会一样,是工人互相研究技艺的机关”。邓中夏批评了这种观点,他指出:“娱乐、救济、研究等,只是工会中的一部分工作,不是工会全部的事务,即是说工会对于工人娱乐、互助研究这一类的事,是可以做的,但不是专门来做这类的事,因为专做这类的事,并不能使工人得到很多利益,得到完全的解放。”从这个意义上讲,长辛店工人俱乐部是新时期职工文化的重要源头。

1922年4月9日,长辛店工人俱乐部正式成立。长辛店工人俱乐部的建立具有很强的示范效应。“在中国职工运动的初期,‘工人俱乐部’这一名称,相习成风,成为当时全国各地(广州除外)工会通用的名称。”在长辛店工人俱乐部成立之后,一批由共产党人领导的、方向明确、组织坚强的产业工会和地区工会组织,如雨后春笋,破土而出,茁壮成长,为即将到来的全国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,作了组织上的准备。1926年3月6日,毛泽东在听取铁道部长滕代远汇报铁路工作时指出:“中国工人运动还是从长辛店铁路工厂开始的”。 □乔东

“塘马”“羊舟”传情报 古人防汛有妙招

钩沉

近日,南方强降雨来袭,多地百姓受到洪涝灾害的影响。自古以来,洪灾就是常见的自然灾害之一,大禹治水的传说故事很早就流传民间。古人治水有啥妙招?

法规:官员轮流上堤指挥 河务按月上报

早在三国时期,蜀相诸葛亮就制定了防洪法规:“按九里堤捍护都城,用防水患,今修筑竣,告尔居民,勿许侵占损坏,有犯,治以严法,令即遵行。”通过修筑九里堤来防洪治水,可见古人未雨绸缪的智慧,并“治以严法”来保护堤坝。

唐高宗永徽年间,颁布了一部重要法典《唐律疏议》,其中也记载了严格的防洪法规:“诸不修堤防及修而失时者,主司杖七十”,“以故杀伤人者,减半杀伤一等。若通水人家,致毁害者,亦如之。”条文规定修堤防不及时要受到惩

罚,如果故意破坏堤防更是死刑,可见当时朝廷对于防汛是非常重视的。

金元时期也颁布了关于黄河及海河水系诸河流的修守法规《河防令》。在黄河“涨水月”,州县河防官员要轮流上堤指挥防汛;河务情况要按月呈报工部;对未设专职堤兵守护的河流,出现险情时也要差员救护等规定。

明清时期,产生了《堤甲法》,其中规定每千丈堤老一人,五百丈堤长一人,百丈甲一人,职责是“夏秋守御,冬春修补,岁以为常”,防洪成为“常态”。

预警:“水报”“羊报”传递汛情

除了设立法规,古代还有洪水预警机制。古人就曾多次尝试通过预测水位减少洪水灾害的发生。水利专家陈潢就是其中一位。他在辅助河道总督靳辅治水时曾发明了“测水法”,这种方法可以使正河保持一定的流速流量,把“束水攻

沙”的理论置于更加科学的基础上,有效治理了洪水,这对我国河道管理理论作出了显著贡献。

后来,为了不让洪水淹没庄稼,产生了“水报”,即黄河堤岸备有报讯的“塘马”。当上游地区经历暴雨,洪水陡长,士兵们便会快马加鞭把消息送到下游,从而加固堤防预防洪灾。“水报”站相传,士兵皆备良马“八百里加急”将消息快速扩散。

除了“水报”,“羊报”也是古代传递汛情的重要手段。据记载,清代设有水位观测标志,根据原有水位来判断汛情。每当遇到险情时,水卒会带着干粮和“水签”也就是情报,坐上“羊舟”(缚着羊皮袋泗水)向黄河下游的河防传递汛情。随流漂下时,沿水路每隔一段投掷水签通知,下游的守卒会于缓流处接应,并迅速做好防汛准备。

工程:堤坝水渠防洪排涝

水利工程在防洪排涝中发挥着重要

作用,都江堰、灵渠、赵州桥都是古代重要的水利工程、防水工事。

灵渠建于秦朝,是秦始皇下令修建的,一直被沿用至今。郭沫若曾在《满江红·灵渠》中写道:“亲眼见,秦堤牢固,工程精当。闻水陡门三十六,劈湘碎嘴二千丈。有天平小大溢洪流,调分量。”历史上,灵渠在航运、灌溉、防洪等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。

除了灵渠,都江堰也是古代知名的水利工程之一。都江堰始建于秦昭王末年,是蜀郡太守李冰父子在前人基础上组织修建的大型水利工程,同时也是全世界迄今为止,年代最久并且沿用至今的以无坝引水为特征的宏大水利工程。两千多年来,它一直发挥着防洪灌溉的作用。

说起防洪防水,自然少不了赵州桥。得益于匠师李春运用巧妙的设计,桥体至今屹立不倒,守护着百姓。 □杜佳妮

语林指瑕

说来话长。自1983年起,笔者编辑《陕西工人报》副刊二十余年,接触的作者为数不少。那时尚未有现今的电脑手机传稿,稿件均是手写体,或送或邮,而到编辑部。凡送稿者,我大都提出或选用或修改或退稿的意思。大约在1990年某日,我接待了某厂脸上已有些沧桑的作者,他送来的诗作,内容是歌颂改革开放的,起首一句便是“芳龄五十三”。开宗明义,是说自己感到年轻了。我将其诗作看完后,提出了修改意见,并指出“芳龄”运用之不当。说来也巧,就在我作此文之当日,即2019年11月6日,又见央视播放电视剧《外交风云》,竟称38岁的剧中人何志武(佟大为饰)为“芳龄”。“芳龄”,美好的龄,犹“妙龄”,与芳年同为赞美青春年少之词。尽管男女皆可用,却是偏重于女性。年龄较大的女性已不适用,更不能用来指年龄大的男子。道理很简单,男女有别。正因如此,所以窈窕、娥眉、美艳、令爱、豆蔻年华等词,并不适用于男性。至于“河东狮吼”,“环肥燕瘦”,本义皆指女性而言,此不可不察也。“河东狮吼”,本是形容悍妇的,有人不知此义,而用以指莽汉。2005年8月16日《现代快报》有篇文章《我认识你》。中有句云:“就在这时,一个中年男子飞奔过来,一把抢过话筒,大吼一声:‘我认识你!’”他的声音如同河东狮吼。”依文中所述,可见这中年男子其行其声,大有喝断当阳桥的张飞之味,大声吼叫,是粗犷,还是鲁莽,这里不必评论,但说这“河东狮吼”,就用得错过瓜洼国了。此四字是比喻妻子妒悍,常用作嘲笑惧内(怕老婆)之人。宋代洪迈《容斋随笔》记载,陈德字季常,自称龙丘先生。好宾客,喜蓄声妓。而其妻柳氏绝凶妒,故苏轼有诗云:“龙丘先生亦可怜,谈空说有夜不眠。忽闻河东狮子吼,拄杖落手心茫然。”河东为柳姓郡望,“狮子吼”,佛家以喻威严,而陈德好谈佛,故苏轼借佛家成语为戏。后遂泛称妇悍为“河东狮吼”,妇怒为“狮吼”。

宗文书局的《历代小品》中,就有篇《文殊菩萨》,文殊菩萨是佛教中的菩萨,坐骑为狮子。该文亦可证河东狮吼指悍妇。文曰:一人诨号文殊菩萨,闻其名者,皆不知其命意之所在。一日问其所素狎之友,友曰:“因其名为悍妇,故得此雅号耳。”曰:“岂文殊菩萨有悍妇耶?”曰:“非也,因为悍妇有河东狮子之称故耳。”曰:“河东狮子与文殊菩萨何干?”曰:“狮子非受文殊菩萨所骑者耶?”问者为之粲然。明乎此,便可知“河东狮吼”与男人无涉。“环肥燕瘦”,“环”指唐玄宗贵妃杨玉环,“燕”指汉武帝皇后赵飞燕。玉环天生丽质,丰腴雍容,回眸一笑百媚生;飞燕绝代佳人,体态轻盈,能为掌上舞。她们同称美人。后世因其形容女子体态不同,而各有风致(诗文中常借以比喻各种艺术作品流派、风格、样式各有所长,皆擅其美。)并不涉及俊男。而2006年8月16日,浙江卫视“相亲”的节目《男生女生》中,节目组邀来百位各种类型的男生,供女嘉宾们“挑选”。一出场,个个都是帅哥,女主持见此脱口而出:“环肥燕瘦”!可惜用错了。由此我想起了一段佳话。五代前蜀时,临邛(今属四川)人黄崇嘏,本一才女,却自幼作男儿装,人皆以其为男,蜀相周庠举荐其代行司户参军的职务,黄干得非常出色。周庠便想把女儿许配给黄崇嘏。黄不得已而作《辞蜀相妻女》诗云:“一辞拾翠到江涪,贫守蓬茅但赋诗。自服蓝衫居郡掾,永抛鸾镜画蛾眉。立身卓尔青松操,挺志慤然白璧姿。幕府若容为坦腹,愿天速变作男儿。”“坦腹”系用晋代王羲之典,即女婿。因之女主持说俊男们是“环肥燕瘦”,显然是用错了。倘若真要以此作比,那大抵还须戏翻黄崇嘏诗中的后两句:“若容俊男为环燕,愿天速变作女儿。” □杨乾坤

由「芳龄」说开去

怀念杨绛:且以“不争”过一生

幸有所爱:“我和他一样”“我也一样”

1935年7月13日,钱锺书与杨绛在苏州举行了结婚仪式。多年后,杨绛幽默地回忆道:“(《围城》里)结婚穿黑色礼服、白硬领圈给汗水浸得又黄又软的那位新郎,不是别人,正是锺书自己。因为我们结婚的黄道吉日是一年中最热的日子。”

杨绛在陪同钱锺书在牛津大学学习时,因钱锺书不喜欢英文古文书学加上

粗心竟考了不及格,杨绛使用一只耳挖子的尖头,一个一个点着帮助钱锺书认识英国古人到今天书写是如何变化的。钱锺书的家人曾感慨道,“笔杆撑得,锅铲握得,在家什么粗活都干……真是上得厅堂,下得厨房,锺书痴人痴福。”

家有贤妻,无疑是钱锺书成就事业的最有力支持。1946年初版的短篇小说集《人·兽·鬼》出版后,在自留的样书上,钱

锺书为妻子写下这样的情话:“赠予杨季康,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:妻子、情人、朋友。”

曾经,杨绛读到一位英国传记作家概括最理想的婚姻:“我见到她之前,从未想到要结婚;我娶了她几十年,从未后悔娶她;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。”她把这段话念给钱锺书听,钱锺书当即回答说,“我和他一样”,杨绛答,“我也一样。”

严谨治学:一是“慢”,二是认真

杨绛最令人瞩目的成就之一,莫过于等身的翻译作品。为了翻译塞万提斯的名著《堂吉珂德》,精益求精的杨绛选择直接从原文人手,为此,48岁的她,开始自学西班牙语,耗费十多年心血才完成该书的翻译工作。

在《失败的经验——谈翻译》一文中,杨绛曾用“一仆二主”来诠释译者的使命,“同时伺候着两个主人:一是原著,二

是译文的读者”。翻译家叶廷芳撰文回忆道:“她绝不拿时间换产量”。杨绛也曾说:“我翻译其实是很慢的,首先要将每段话的原意弄清楚,然后把每个原文句子统统拆散,再按照汉语的语言习惯重新组织句子,把整段话的原意表达出来。”

在文学评论家白桦的眼里,杨绛则是一个“特别认真”的人。上世纪九十年代,白桦作为责编出版过《杨绛作品

集》。白桦回忆道:“事先友人曾告诉我,对杨先生没完没了地校改作品一定要有准备。即使如此,我仍没有料到编完杨先生几经删改的书稿,发稿之后又数次有补正,排校之后还不断有校改,这一过程一直持续到最终出书。”

正是从这一“慢”、“认真”的斑驳往事里,我们看到了以杨绛为代表的一代学者严谨求实、精益求精的可贵品质。

人生边上:一滴清水,淡泊名利

杨绛的一生,诠释着“不争”二字,活得干净洒脱。杨绛还有篇散文名为《隐身衣》,文中直抒她和钱锺书最想要的“仙家宝”莫过于“隐身衣”,隐于世事喧哗之外,陶陶然专心治学。

2004年《杨绛文集》出版,出版社准备筹划其作品研讨会,杨绛风趣回绝:“稿子交出去了,卖书就不是我该管的事了。我只是一滴清水,不是肥皂水,不能吹泡泡。”

杨绛的“不争”也并非忘却这个世界,相反,她不断叩问人生。2007年,

她以96岁高龄完成了《走到人生边上——自问自答》,这本书完全依据自己的生活经验,朴素地回答了有关生与死的问题,有着深刻的现实关怀:“我正站在人生的边缘上,向后看看,也向前看看。向后看,我已经活了一辈子,人生一世,为的是什么呢?我要探索人生的价值。向前看呢,我再往前走,就什么都没有了;当然,我的躯体火化了,没有了,我的灵魂呢?灵魂也没有了吗?有人说,灵魂来处来,

去处去。哪儿来的?又回哪儿去呢?说这话的,是意味着灵魂是上帝的死了,又回到上帝那儿去。可是上帝在吗?灵魂不死吗?”

杨绛还以全家三人的名义,将高达八百多万元的稿费和版税全部捐赠给母校清华大学,设立了“好读书”奖学金。帮助那些家境贫寒的学子完成学业。虽然“万人如海一身藏”,杨绛仍以特殊的方式悄悄影响和改变着这个世界。 □韦衍衍



7月17日,是杨绛先生诞辰119周年纪念日。杨绛,本名杨季康。跨越两个世纪的人生起伏,她是安静、优雅、博学的女性;在钱锺书眼里,她是“最贤的妻,最才的女”。

先生之笔,于无声处见慈悲;先生之风,绚烂至极见真淳。“我和谁都不争,和谁争我都不屑。简朴的生活、高贵的灵魂是人生的至高境界……”她是杨绛,一个把自己的人生活成了传奇的女子。